



世界文学名著

罗亭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冯加 奉真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罗亭 贵族之家

[俄]屠格涅夫 著

责任编辑:谢 引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望城湘江印刷厂印刷

*

1996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875

字数:274,000 印数:1—10,000

豪华精装: $\frac{\text{ISBN}7-5404-1535-5}{1 \cdot 1224}$ 定价:21.60 元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印刷厂技质科联系调换

(厂址:望城县高塘岭镇郭亮路 69 号 邮编:410200)

罗 亭

冯 加译

《罗亭》译本序

魏 玲

长篇小说《罗亭》是屠格涅夫的代表作之一，是他创作的六部长篇小说中的第一部。

屠格涅夫是十九世纪俄国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尽管他具有温和的贵族自由主义的倾向，但他在创作中严格地遵循着现实主义的方法，把“准确而有力地再现真理和生活的真实视为作家最大的幸福”，所以，他的作品还是相当真实而深刻地反映了俄国的社会生活。他说过：“一八五五年成书的《罗亭》的作者和一八七六年成书的《处女地》的作者是同一个人。在整个这段时间里，我集中精力和智慧努力地、忠实地把莎士比亚所说的‘时代本身的形象和印记’以及我的主要观察对象——迅速改变着俄国知识阶层的面貌描绘出来，并表现为适当的典型。”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出身于贵族或来自平民的知识分子。作者着力地描写了他们在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开始大变动的年代所进行的思想探索的轨迹。人们把这些小说称作十九世纪三十——七十年代俄国社会思想发展的“艺术编年史”是有道理的。

《罗亭》写于一八五五年，一八五六年发表于《现代人》杂志上。它很早就被介绍到了中国。一九二八年，《罗亭》的第一个中译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三六年，文化出版社出版了陆蠡的译本。迄今为止，《罗亭》已经有了五种中译本。以往多数译文是从英译文转译过来的，冯加的这个译本则是直接从俄文译出的。译

者力求准确、较完美地表达原作的内容和风格，以期读者在欣赏这部作品时，能真切地领略到原作的那种特有的抒情氛围，“透明的诗意”。人们是应当感谢译者为此付出的辛勤劳动的。

《罗亭》这部作品描写了主人公罗亭这个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优秀贵族知识分子在四十年代的思想经历。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围绕着罗亭的一段动人的爱情悲剧故事而发生和展开的。

罗亭生长于一个贫穷的贵族家庭，靠亲友的接济完成了大学学业，随后出国留学，在德国研究哲学和诗歌。他受过良好的教育，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青年。他热衷于社会改革，希望自己能够为祖国、为人民做出一番事业。但他在生活中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他的所有的努力也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挫折。他终于一事无成，直到一八四八年六月牺牲在巴黎起义者的街垒上。作者曾不无戏谑地称罗亭为“浪迹天涯的王子”，罗亭自己则满怀忧伤地以“永远漂泊的犹太人”自嘲。他是一个“多余人”，是俄国文学史上“多余人”形象画廊中的一个具有特色和光彩的典型。

在罗亭之前，俄国文学中就已经有了不止一个“多余人”的形象了。普希金笔下的叶甫盖尼·奥涅金生活在二十年代，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中的毕巧林和赫尔岑的《谁之罪？》中的别里托夫生活在三十年代。这些二十——三十年代优秀贵族知识分子受到西方进步思想的影响，开始对黑暗的农奴制和封建专制统治产生怀疑和不满。他们与自己生活的环境格格不入，但又意志薄弱，无力行动。愤世嫉俗的奥涅金过着闲散疏懒、无所事事的生活；不甘寂寞的毕巧林在冒险猎奇、爱情游戏中寻求刺激、宣泄不满、虚掷青春；博学多才的别里托夫虽然渴望从事有益的事业，但脱离实际、耽于幻想，最终也一事无成。罗亭和奥涅金，毕巧林、别里托夫同属“多余人”的家族，有着共同的特点和类似

的悲剧命运。但他与他们又有很大的区别，因为他的活动主要是在四十年代。

在经历了一八二五年“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以来一段暂时的沉寂之后，从三十年代末开始到四十年代，俄罗斯社会思想进入了一个惊人腾飞的阶段。安年科夫称之为俄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十年”，赫尔岑称之为“精神需要达到亢奋状态的时代”。四十年代的俄国，一方面，仍然是黑暗的封建农奴制的统治，另一方面，随着工业的初步发展，反抗这种黑暗统治的新的社会力量也开始生长起来；一方面，仍然是封建专制的统治，另一方面，思想的禁锢稍稍有了一点松动，人们开始生活在一个多少有点活力、有点自由的氛围之中。处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之中的罗亭，不再像他们前辈那样满足于对黑暗现实的单纯的怀疑和否定了，他开始热情地憧憬光明的未来，开始进行寻求社会出路的思考。他不再只是耽于内心的自省，而是开始了行动的尝试；他挣脱了奥涅金、毕巧林式的贵族利己主义的羁绊，而热烈地呼唤“根除顽固的私心”，“牺牲自我来为大众谋利益！”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他身上的一切——从他的思想到他的行动，从他的性格到他的习惯都是新颖的”。他毕竟是另一个时代的“多余人”，他更多地考虑的是自己的社会职责。与自己的前辈相比较，他的精神生活要复杂得多，丰富得多，他的社会思想也前进得多了。

罗亭这个形象并不是作者凭空臆造的。屠格涅夫自己讲过，“我从来不凭空臆造。为了塑造一个虚构的人物，我必须为自己选择一个可资作为我的主导线索的活生生的人。”其实，作为罗亭原型的，也不仅仅是一个人。高尔基认为，“罗亭既是巴库宁，又是赫尔岑，有一部分还是屠格涅夫自己。”屠格涅夫对赫尔岑和巴库宁都是很熟悉的。他尤其与后者，有着较深的友谊，他曾与之有过直接的交往。他承认，“我在罗亭身上相当真实地展现了他的形

象”。当然，“诗学的真实性的胜利在于典型化”。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去描摹这些原型，而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把这些原型的许多个别因素集中起来了。

罗亭是在波科尔斯基小组中度过自己的青年时代的。作者笔下的这个小组就是三十年代莫斯科大学的斯坦凯维奇学生小组。而波科尔斯基的原型也就正是斯坦凯维奇本人（其中也反映了别林斯基的某些特征）。这种学生小组在三十年代的莫斯科大学出现过不止一个。在这种小组里集合了一群天赋很高的年轻人，他们热烈地讨论哲学、诗歌，探索真理和人类社会的未来。他们是富于社会理想，有进取精神的年轻一代的探索者。他们信奉黑格尔的学说，宣传进步的哲学思想，在俄国社会思想发展史上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是新一代的启蒙者。

罗亭是小组里的活跃人物。他崇尚哲学理论，强调思想的重要性。他说过：“人不能单靠观感来生活，他们不应当害怕思想。”他用思想的力量影响大家，激发人们献身理想和伟大事业的热情。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把自己在年轻时代的理想和追求坚持到底的。小说中的罗亭和列日涅夫这两个当年学生小组的热情的参加者，后来就选择了两条迥然不同的生活道路。列日涅夫与现实妥协了，这个“有家产”的年轻人为自己营造了一个安乐窝，在那里过着闲适的生活，只是作为青年时代曾有过的理想的一种变形的遗留，他偶尔也对平庸的生活表示出一点嘲讽的态度而已。罗亭则不同，他坚持自己的理想，不与黑暗的现实和庸俗的生活妥协，无论遭到怎样的挫折和打击，都始终没有放弃对于真理的求索。尽管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屠格涅夫赞赏列日涅夫的处世原则，但他对于理想主义者罗亭仍然不能不怀有深深的敬意。他借列日涅夫之口说道：“凭他（罗亭）的才能，只要他愿意，什么成就他不能取得，什么人间财富不能拥有！……可是我眼前

的他却在忍饥挨饿，无地自容……”“无论他怀着什么样的意愿开始做一件事情，每一次的结果必然是牺牲自己的私利，而不肯在恶劣的土壤生下根，不管那土壤是多么肥沃。”

《罗亭》里的故事，主要是罗亭在拉松斯卡娅的庄园里的短暂生活中发生的。他第一次在女主人的沙龙中出现，就以自己的炽烈的感情，对科学的信念，对崇高理想的真诚追求，学识的渊博，雄辩的口才，机敏的思想和语言的逻辑力量，显示出自己高于周围的人群，高于当时的生活。他使庸俗不堪的皮加索夫恼怒，使女主人的食客兼义子潘达列夫斯基妒嫉。他使家庭教师、刚刚毕业的平民大学生巴西斯托夫成了他的狂热的崇拜者，认为他“不仅善于震撼你的心灵，他还会推动你前进，不让你止步停顿，他让你彻底改观，让你燃烧起来”。他使纯真的少女娜塔利娅对他产生了深深的爱慕，使她一心等待他的召唤，准备与他一起去从事崇高的事业，走上新生活道路……。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在他的身上，显示出一种诗意的光辉。但是，时隔两年之后，当列日涅夫在一个外省的旅店里偶然与罗亭相遇时，他已经穷愁潦倒、充满哀怨，并且显得疲惫而苍老了。只有一点没有改变，那就是：他仍然在梦想着“做一点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于人有利益的事”。这个曾经以批判的眼光审视过罗亭的人，这时也被深深地感动了。他以敬重的口气对罗亭说：“你精力充沛，追求理想不折不扣……”“尽管你受到种种挫折，这团热爱真理的火还是在胸中燃烧……燃烧得更炽烈。”

罗亭对理想的追求是热烈而虔诚的，以致有时显得有点迂腐，有点滑稽可笑。这使人们不由得联想到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罗亭自己在离开拉松斯卡娅庄园时曾经想到过堂吉诃德，他把自己的境遇与堂吉诃德的境遇作过比较。作者这样描写罗亭不是偶然的。他在自己的著名文学论文《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中讲过

自己对这两个典型的理解。他把哈姆雷特的性格特点归结为“分析主义和利己主义”，“还有怀疑主义”。“他们理解并领会一切，与此同时他们又懦弱无能……畏缩不前”。与哈姆雷特不同，堂吉诃德“首先表现了信仰……对真理的信仰”，他“整个充满着对理想的忠诚，为了理想，他甘愿匮乏，牺牲生命”。作者曾经把自己创造的“多余人”和“新人”的形象分别纳入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这两种类型。罗亭作为“多余人”的一种典型，自然具有哈姆雷特的气质，但有时却更接近堂吉诃德。事实上，正如作者所说，“纯粹的哈姆雷特们，正如纯粹的堂吉诃德们一样，是没有的”，“在同一个人身上两种观点可能相互交替，甚至可能有某种程度的融合”。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应当把罗亭看作是从“多余人”到“新人”之间的一个过渡性的人物。既然这样，这个人物同时具有这两种类型的某些特质，就是不难理解的了。我认为罗亭的思想是堂吉诃德化了的，而他的实践活动则是哈姆雷特式的。他信仰真理，善于进行哲学的思考，但他缺少行动的能力。他在宣传自己的主张时语惊四座，但在行动中遇到困难时，却优柔寡断，束手无策，往往使事情半途而废。他以自己的思想的力量征服了娜塔利娅，但他竟然没有勇气接受她的爱，他甚至劝说她向周围环境“屈服”。正因为如此，人们常常说，罗亭是一个“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

罗亭的思想和性格为什么会有如此深刻的矛盾？涅克拉索夫在当时就对这个问题作过一个相当深刻的分析。他指出，作者在这部小说中描写了优秀的人物，“不久前，他们还站在思想运动和生活运动的前列”，“纵然他们都有弱点和可笑之处，但不能不令人尊敬。总的说来，他们实际上是无力将自己的主张付诸实现的人。这一部分是由于充分实现他们的主张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一部分是由于他们的成熟，与其说是借助于为他们的观点和感情只

提供消极因素的生活，毋宁说是借助于抽象的思维，他们确实主要是按想象生活的……”。历史是人创造的。但人们只能从现实的社会条件出发，而不能超越这种条件，去创造历史。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俄罗斯，必须进行社会变革的意识在一些人的心中觉醒了，但是能够实行这种变革的社会力量还没有成长起来，觉醒起来。贵族革命家的时代过去了，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还刚刚开始登上历史的舞台；农民骚动虽然时有发生，但多数农民还不具备历史自觉的意识；而新兴的阶级力量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则正在形成的过程之中。了解了这些情况，我们就不难懂得涅克拉索夫为什么要说“充分实现他们的主张的条件还不完全具备”了。正因为变革的历史条件还不成熟，反映到罗亭身上，他所追求的理想也仍然是朦胧的，他的主张也是不确定的。今天，他激烈地批判怀疑主义和利己主义，热情地阐述人的短暂生命的永恒的意义，启发人们去完成崇高的使命；明天，他却准备随遇而安，成为一个完完全全地安分守己的人，去倡导靠自己的劳动养活一个瞎眼老太婆和她的全家这类行动。他设计了一个又一个的社会改革的方案，但他从来不知道，甚至也没有想过，应当依靠什么社会力量来实现这些方案。说他限于空谈，是不无道理的。既然他生活在一个不成熟的时代，人们又怎么能要求他具有成熟思想和坚决的行动呢？要知道，任何人都是不能超越时代的局限的。

当然，我们应当承认，作为一个贵族知识分子，罗亭确有自身的许多弱点。他所崇尚的真理只是一些抽象的原则，这些原则并非来自俄国生活的实际，而是来自德国的哲学书籍。正如罗亭的老同学列日涅夫所说的那样，“他的思想并非出自他的头脑”，“他搬用的思想”。他不了解俄国的现实，不了解俄国的人民，更没有意识到应当到人民中间去寻找变革现实的力量。正因为如此，他的思想就只能像是一朵不结果的花，一簇辉耀夜空的瞬息即逝

的焰火，而不可能转化为变革现实的一种坚毅的行动。由于他不愿意同丑恶的世界相妥协，又无力改变这个丑恶的世界，他就越来越有意地去疏远它，越来越陶醉于自己编织的理想的梦幻了，而他的一事无成，也就成为一种必然的结局。

有的俄国文学评论家曾经指出：“罗亭的根本志向同农奴制王国是敌对的。但他不知道如何实现自己的主张，况且他的主张并不完全明确。他的优异的禀赋、智慧、才能和知识落空了。他不善于正确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不善于斗争。这不是他们的过错，而是他们的不幸。”这个评论是客观的，公允的。罗亭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思考的时代、探索的时代，还不是一个行动的时代。他们只“是来自过去，而又达不到未来的中间环节”。对于这一点，罗亭自己似乎也意识到了。他感叹自己“生不逢时”，承认“自己的脚下没有基础”，责备自己“缺少毅力”，“永远也建设不了什么”。他悲哀地说：“做个有用的人谈何容易！”

但是，如果因此以为罗亭只是虚掷了自己的生命，那就错了。涅克拉索夫说得对：在那个时代，像罗亭那样的人“是有重大的意义，留下了深刻而有益的影响的”。他以西方的进步思想来同俄罗斯的封建专制统治的现实相对立，这本身就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虽然他还不能指明俄罗斯社会未来的发展道路，但是他启发人们去怀疑，去思考，去探索，这是实际生活所要求的，他正是他那个时代所需要的启蒙者。他为唤起人们的觉醒所作的努力，不会白费，虽然从播种到收获，这中间隔着一个遥远的年代。高尔基在评论《罗亭》时指出，“假如注意到当时的一切条件——政府的压迫，社会智慧的贫乏，以及农民对自己任务的缺乏认识——我们就应该承认：在那个时代，幻想家罗亭是比实干家和活动家更有益的人物。他这个幻想家是革命思想的宣传者，是现实的批判者，他可以说是在开拓处女地；可是，在那个时代，实干家能

够干出什么来呢？”他认为，罗亭不仅“并没有虚度自己的一生，而且给我们留下了绝好的遗产”。这个评价是很正确的。因为在那个在除掉言论、并且只有隐蔽的言论而外，任何别的行动都不能采取的条件下，罗亭的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热情召唤，对利己主义、怀疑主义的勇敢的批判，正是适应了那个时代的需要。当社会在要求变动，而人们的思想仍处于麻木状态的时候；哪怕有人讲出“一句美好的话这也算做了一件事”。这一点，连与罗亭分道扬镳的自由主义贵族列日涅夫也是不能不承认的。他说：“我们大家都变得不可容忍地谨小慎微、冷漠无情、萎靡不振了；我们沉睡了，冻僵了。所以谁若能唤醒我们，给我们以温暖，哪怕只是一瞬间，我们也要感谢他。”难道不是这样吗？作为启蒙者，罗亭不仅征服了少女娜塔利娅的心，唤起了她的良知和优美的情感，而且唤醒了热情而善良的年轻的平民知识分子巴西斯托夫，而平民知识分子正是将要起来代替老一代贵族革命家的。尽管罗亭自谦地说，“我生来就是无根的浮萍，自己也站不住脚跟”。但他带着理想的种子在俄罗斯的辽阔大地上漂泊着，随时随地撒播着。这不会是徒劳的。没有播种就不会有开花和结实，没有理想就不可能有有力的行动。没有罗亭这样的失败的“空谈家”，就不会有后来的成功的“行动者”。应当说，罗亭是一位先驱者，他是“在完成着自己都不知道的崇高使命”，要不，七十年代的一位革命者为什么会把罗亭的声音比喻为“把我们从沉睡中唤醒的钟声”呢？

历史总是前进的，后人总是要超越前人的。正如一个成年人不会去嘲笑自己幼年时代的稚气行为一样，当一个社会的思想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它也是不会去嘲笑先驱者的幼稚的。人们永远不应当割断历史。无疑地，人们不应当再去重复先驱者曾经有过的弱点和犯过的错误，但他们的这种弱点和错误是需要结合历史条件去说明，而不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一切怀抱着崇高的理想和

有着执著的追求的人们，将永远怀着亲切感及其敬意记忆着这些曾经站在时代潮流前面呼唤未来的人物。这恐怕也是《罗亭》这部作品在中国，从“五四”以来直到今天，一直拥有广大读者的一个重要原因吧。

《罗亭》这部小说，在艺术上也是很成功的。它有力地体现了叙利亚者的精湛的艺术技巧和朴实含蓄的创作风格。它把强烈的戏剧性、浓郁的抒情性和谐地结合在一起了。因此读起来引人入胜，并具有有一种迷人的诗意的魅力。

《罗亭》的情节高度集中，结构精巧简约。情节以爱情悲剧为主线，没有横生枝蔓，不拖泥带水。作品叙述了主人公从上大学到牺牲于巴黎街垒的将近二十年的经历，但集中描写的，只是他在拉松斯卡娅庄园生活的两个月，尤其是其中的四天。第一天，罗亭到达拉松斯卡娅的庄园，通过当晚与皮加索夫的辩论，作者把罗亭的那种对理想的执着追求、炽烈的献身精神和耀眼的才华，都明白地显示出来了。他的雄辩给娜塔利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第二天，罗亭和娜塔利娅单独交谈，激起了这位少女的感情的狂澜，使她产生了追随他去从事崇高事业的愿望。两个月后的一天，男女主人公两次会面，互诉衷情，他真正尝到了爱情的幸福。紧接着第二天，他突然告诉女主人公，幸福与他无缘，他们必须分手。他随即离开庄园，浪迹天涯去了。作者通过叙述男女主人公爱情的萌生、发展和突然终结这一戏剧性的变化，把罗亭这个形象，他的长处和弱点清晰地勾勒了出来。小说没有全面地展现人物的生活经历。作者以有限的篇幅借列日涅夫之口讲述了主人公的前史，从而使得他在庄园生活时表达的思想和采取的行动，对于读者来说成为可以理解的了；在结尾部分，作者又以列日涅夫与主人公的邂逅，讲述了他的漂泊生活的经历，并讲述出他的终局，这样也就解开了读者对于罗亭离开庄园后的经历的悬念。整个故事，主

次分明，虚实相间，疏密有致。这里并没有起伏跌宕的情节，作者所表现的似乎只是平凡的日常生活，但作品却以其自身所蕴含的深刻的社会冲突而引人入胜，扣人心弦，富有戏剧性。小说中出场的人物很少。对大部分次要人物，作者只是以寥寥几笔来勾勒出他们的轮廓。但这些次要人物又是不可缺少的。作者通过对他们的不同性格和同罗亭的不同关系，从各个侧面，把罗亭这个形象完整地衬托了出来。比如，以皮加索夫的肤浅的诡辩反衬罗亭的深邃的思想；以沃伦采夫的平庸和木讷反衬罗亭的才华和机敏；以列日涅夫的冷漠和袖手旁观的人生态度反衬罗亭的热情和积极进取的事业心。男女主人公罗亭和娜塔利娅这对情侣的性格的反差是很大的：一个热情奔放、能言善辩；另一个深刻含蓄、沉默寡言；但在决定爱情命运的关键时刻，罗亭退缩不前，而娜塔利娅却果断坚毅。在往后的发展中，在爱情生活中向命运妥协者和抗争者，在社会生活的大舞台上又调换了位置：罗亭在探索真理的道路上不屈不挠地行进着，而娜塔利娅却与现实妥协，开始了平庸的贵族家庭的生活。正如“音乐混合不同音调的高音和低音，长音和短音，从而造成一个和谐的曲调”（赫拉克利特）一样，在屠格涅夫的作品中，人物的矛盾性格在对照中显得更为鲜明生动。

小说中的人物语言都是高度个性化了的。每个人讲出的话语，正好符合于他们各自的社会地位、文化水平、性格、气质。比如潘达列夫斯基，他的话最少。他当面说出的不多的话语，无不带着浓厚的阿谀奉承色彩的自谦之辞；私下的独白，则多属对人的十分刻毒的谩骂。这正好符合他的身份。主人公罗亭的语言，则明白、准确，具有不可征服的逻辑力量。这些语言富有哲理性，内容深邃，意味深长，有的近乎是箴言警句。如：“只有牺牲自我来为大众谋福利的人，才配得上人的称号”。“一个自私的人如同

一颗孤零零的不结果实的树，会一天天的枯萎下去”等等。他所叙述的关于探索人生意义的斯堪的纳维亚的传说和用关于橡树叶子的脱落和新生来暗示人的感情的转移、新的爱情的滋生的议论，也都是十分耐人寻味的。这些语言，把理想主义者罗亭的性格直接地表现了出来。

对话在作品中占有特别重要的位置。这是不难理解的。四十年代是俄国各种思潮活跃、论争激烈的时代，罗亭作为当时优秀的贵族知识分子的代表，正是以言语作为他的社会活动的主要方式的。他的语言的洪流几乎冲击着影响着周围所有的人。比如罗亭与皮加索夫之间围绕着知识、原则、规律、理论的作用和是否存在真理的问题展开的辩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证。比如罗亭与娜塔利娅在阿夫久欣池畔的那番自省性的诀别谈话和娜塔利娅对他的尖锐谴责，就是相当集中地反映了作品的主题，并且画龙点睛地把这个“言语的巨人、行动的矮子”的本质特征集中地勾画了出来。如果仔细地品味，读者将会发现，这些生活中的对话有许多也是富于哲理性的。在小说中作者精心设计了多次有如舞台剧般的对话场面，从而使作品具有了浓厚的戏剧性。

浓厚的抒情性，富于诗意的魅力，这是小说的一个重要的艺术特色。的确，那充溢在他的作品中的浪漫主义的热情氛围，诗意的情调，是令人难忘的。因为作者在创作时不仅调动了各种艺术手段，而且注入了自己的全部激情。他认为，人是“永恒真理的活的容器，活的工具，负有使命要做出一番伟大的事业”。所以，他热情地歌唱具有自由思想的理想主义者的理想、热情和献身精神。他使自己精心摄取的主人公的精神腾飞和升华的瞬间，弥漫着诗意的光辉。他还是“纯洁理想的少女爱情的歌手”（杜勃罗留波夫）。他笔下的少女娜塔利娅的形象是那样的美丽、善良、单纯、质朴无华，而在追求美好生活时，又是那样的坚定、勇敢。她简

直成了一种理想少女的诗意的化身了。他对俄罗斯风景的描写也是独具特色的。他通过恋人的眼睛来观察周围的环境，把大自然描绘得无比的清新、瑰丽、简直是如歌、如诗、如画……。他把诗歌和音乐的形象也引进这种描写中来了。作者认为，“描写的才能完全应体现在能引起联想的细节的选择上”。他主张“描写始终是间接的，与其直言不讳不如暗示”。作者的这种诗意并不是通过大段的抒情性的插叙来表现，而是蕴含在整个情节的叙述之中的。小说即使在高潮部分，也就是在叙述罗亭和娜塔利娅互诉衷情的场面时，作者使用的语言也是很含蓄的。比如娜塔利娅在回答罗亭“您爱我吗？”这个问题时，只是低声地说：“我觉得……是的……”，“我将是您的。”由于写得含蓄，也就给读者的想象留下了回旋的余地，使人们能够凭着自己的生活体验去参与形象的再创造，从而获得一种特有的审美愉快。法国批评家莫洛阿说过：“使用现实主义这一个语汇来形容屠格涅夫的艺术是不够的，还必须补充说，他是一位富有诗意的现实主义作家。”这些赞美，屠格涅夫是当之无愧的。

应该说，屠格涅夫作品所具有的这些艺术特色，也是它对于不同国家的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具有永久性魅力的原因之一。

一九九四年十二月

一个宁静的夏天早晨。太阳已经相当高地挂在明净的天空，但是田野里依然露珠闪烁。初醒的山谷弥漫着芳香而清新的凉意，而在潮气未消、尚不喧闹的树林里，宿鸟已经在快活地歌唱。平缓的山坡，从上到下披着刚刚扬花的黑麦，可以看到山顶上有一座不大的村落。狭窄的乡间小道上，有个少妇正朝这个小村走去。她身穿白细纱连衣裙，戴一顶宽边圆草帽，手里打着小阳伞。一名小僮在不远处跟随着她。

她走得不慌不忙，似乎在享受着这步行的乐趣。四周，高高的黑麦迎风摆动，那长长的麦浪带着柔和的沙沙声奔向远方，时而泛出一片银绿，时而涌起一道红波。云雀在高空中婉转啼鸣。少妇是从自己的田庄里出来的，这田庄离她正要去的小村不到一俄里^①路。她名叫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利平娜，一个寡妇，没有子女，相当富有。她和她的弟弟，退役的骑兵上尉谢尔盖·帕夫里奇·沃伦采夫住在一起。他还没有结婚，目前替她管理田产。

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来到了小村，在村头一座破旧不堪的低矮的农舍前停了下来。她叫来小僮，让他进屋去探问女主人的病情。小僮很快就回来了，一同出来的还有一个年迈体弱的白胡子老头。

“哎，怎么样？”亚历山德拉·帕夫洛夫娜问。

“还活着……”老头回答。

“可以进去吗？”

“怎么不可以，请吧。”

^① 一俄里合一·〇六公里。